

doi:10.16018/j.cnki.cn32-1499/c.201704010

论明初的皇权统治与出版

秦海明

(淮海工学院 学术刊社,江苏 连云港 222005)

摘要:明代出版被普遍认为是中国古代出版的巅峰,但事实上明代各个阶段的出版活动呈现出较大差异。在明初的洪武至宣德时期,出版活动陷入了一个低谷,活跃程度和整体态势甚至不及元末,其主要原因在于该时期的出版受到皇权专制统治思想的制约,主要表现为:明初统治者对图书出版的重视在一定程度上囿于制书出版,对民间出版基本上一致表现为严控与压制,其目的在于进行思想教化,维护专制统治。另外,明初文人在专制统治的政治背景下被皇权集体压制,致使他们的社会地位不高,命运悲惨,这也使私人出版行为受到严重打击。从宏观形态来看,明初的出版事实上成为皇权统治的工具,体现了当时的一种统治思想。

关键词:明初;皇权统治;出版;分期;文人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092(2017)04-0053-06

明代图书出版极盛,已为学界共识。在明代尤其是进入中后期,政治格局变化、社会经济转好、资本主义萌芽以及印刷技术进步,使图书出版事业逐渐发达,成为我国古代图书出版公认的“黄金时期”“鼎盛时期”。关于这一点,史料已给以印证。《明史·艺文志》有云:“至明御制诗文,内府镂板,而儒臣奉敕修纂之书及象魏布告之训,卷帙既夥,文藻复优,当时颁行天下。外此则名公卿之论撰,骚人墨客一家之言,其工者深醇大雅,卓卓可传。虽有怪奇驳杂出乎其间,亦足以考风气之正变,辨古学之源流,识大识小,掌故备焉。挹其华实,无让前徽,可不谓文运之盛欤!”^{[1]2343}时人论著亦甚多。据粗略统计,明代出版物数量大约在3.5万种^{[2]15}。明代出版的突出地位从与前朝后代的对比中也可概览。元代出版亦较为兴盛,特色十分鲜明,但从出版物数量、种类和商品化程度,内容的丰富程度,出版主体的广泛程度,以及出版的管理制度等方面来考量,与明代相比要逊色许多,这本也符合事物演进的一般规律。转至清代,朝廷为强化集权统治,在文化思想方面实行高压管理,对出版内容、刊刻形式的管制极为严格。受此影响,清代文人的学术活动转向典籍

研究考证,出版则以经典典籍为主,对于出版事业而言,这实质上是一种倒退。关于这一点从清代十分突出的训诂学和校勘学成就中可窥见一斑。清代高度集权的专制统治对出版影响甚为深刻。

对于明代的出版事业,古今中外都给予了较高的关注,产生了大量的研究成果,从官刻到家刻、坊刻,从版本到藏书,从御制到商业,从雕版印刷到活字印刷,涵盖了包括出版思想、出版技术、出版流程、出版格局在内的方方面面,也涉及到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地理交通等各个领域,即使针对某一时间段展开全面论述也是不可能的。本文旨在探讨皇权专制统治背景下的出版以及政治环境对出版的影响问题,因此主要分析出版作为文化传播和思想教育手段在国家意志和皇权统治之下的形态与走向,即与上层建筑相关的出版主体的出版思想对出版行为的指导,更多的是呈现一种较为宏观的考量,对印刷技术、编校手段及版本流变等暂不涉及。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政治对经济文化包括出版的影响,在各个国家的不同历史时期都是存在的,在我国明代初期这一点更为明显。以明太祖、明成祖的强权统治及

其文化水平来看,对知识分子和文化传播的严格控制也是极为可能的,甚至是我们难以想象的。当然,文化对政治经济也会形成一定推动或阻碍作用。作为文化传播重要形式的出版,其在明初期对政治经济的作用并不明显,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出版在明后期尤其是明末对政治权力产生了一定的制衡,这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政治权力与出版力之间的此消彼长。对此,井上进认为政治权力的式微是印刷文化繁荣的先决条件^[3]。

由于各个时期的政治环境不同,出版与政治的关系也就呈现出不同特点,因而各个时期的出版与政治关系的研究也就有了各自不同的内容。明代作为封建集权和专制统治的顶峰时代,统治者为了巩固皇权、维护统治,对文化活动势必实行严格的管控和限制,而出版事业作为一项重要的文化活动势必受到专制统治的深刻影响。

—

明代,以权力博弈和政治格局为主的政治形势在前后期经历了大起大落,表现出巨大差异,而出版也几近于同步表现出了类似的大起大落,局面迥异。

本文既为明“初期”之出版探讨,则必然涉及明代出版的分期问题。而事实上,明代出版的分期也因明代出版事业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巨大转变成为此项研究不可回避的一个问题。众所周知,明代出版以时间顺序从前到后,大体上经历了从严格管制到宽松管理、从经典典籍到大众读物、从官刻官营到高度商业、从雕版印刷到活字印刷等一系列的变迁,在出版内容与思想、出版技术与材料等方面都表现出了巨大的差异,且不同阶段具有该阶段的鲜明特点。对此古人已进行过比较:

国初书版,惟国子监有之,外郡县疑未有,观宋潜溪《送东阳马生序》可知矣。宣德、正统间,书籍印版尚未广,今所在书版,日增月益,天下古文之象,愈隆于前已^{[4]128-129}。

浙之衢州民以抄纸为业,每岁官纸之供,公私糜费无算。而内府贵臣视之,初不以为意也。闻天顺间,有老内官自江西回,见内府以官纸糊壁,面之饮泣,盖知其成之不易,而惜其暴殄之甚也。又闻之故老云:洪武年间,国子临生课簿、仿书,按月送礼部。仿书发光禄寺包面,课簿送法司背面起稿。惜费如此。永乐、宣德间,鳌山烟火之费,亦兼用故纸,后来则不复然矣。成化间,流星爆杖

等作,一切取榜纸为之。其费可胜计哉!世无内官如此人者,难与言此矣^{[4]153}。

明代出版前后差异较大,贯穿明代始终的宏观出版问题研究,无视时期划分、不加区分笼统论述显然不够严谨。缪咏禾先生认为明代出版事业至少可以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其分界在正德。从当前大量的论著成果来看,明代出版一般被分为前中后三个时期。这种分期也出现两种情况,一种给出较为清晰的时间界限,另一种则是模糊分界。前者如周采泉从洪武到弘治、从正德到隆庆、万历之后的分期,李致忠从明初到正德、嘉靖到万历中期、万历后期至明亡的分期^{[2]10},沈燮元洪武到弘治、正德到万历、天启到崇祯的分期方法^[5],等等。此类分期方法着眼点为出版物形式,包括出版物的版式设计、材料使用等。大多数研究的分期则采用后者,即将明代出版模糊表述为“前期”“中叶”“后期”等,这种分期方法其依据无疑应该是明代的政治阶段划分。一般来说,以政治为主线的明代阶段划分包括明建立至弘治的前期、正德至万历初年的中期、张居正之后至明亡的后期三个阶段。可以看出,出版的分期与政治分期存在某种暗合与关联。

本文探寻体现皇权统治的政治与出版之间的关系,因而着眼点在于政治,重点在探讨明初与文化传播活动密切相关的政治行为和政治文化对出版产生的影响。明太祖在建国初期吸取元朝教训,对中央和地方行政体制进行大刀阔斧改革,奠定了明代的基本政治框架,其一系列集权统治措施对明后世产生重要影响。建文帝在位时间短,尽管曾宽刑省狱,致力革除前朝弊政,但随着明成祖的即位,“建文中更改成法,一复旧制”^{[1]75}。成祖继承太祖治国之策,专制统治不弱其父,政治形势严峻苛刻。之后洪熙、宣德缺乏雄才大略,也无开疆拓土,因此转而守成,与民休息。正统之后,政治退化倒转、社会秩序日趋混乱,文人集团逐渐对皇权形成一定制约,集权统治相较于前出现弱化。孟森在《明史讲义》也说:“棣人即帝位,尽反建文朝政……太祖开国之法度颇有变易……至仁宣两朝,承成祖之业,未有蹉跌,合为一时代述之。”^{[6]78}鉴于此种情形,谨慎起见,本文“明初”选定为洪武至正统之前的一段时期。

二

明初,战乱初平,社会矛盾复杂尖锐,社会问

题如影随形,明太祖以“不学之人”对图书予以高度关注,对出版售书给予政策优惠和鼓励。“明太祖定元都,大将军收图籍致之南京,复诏求四方遗书,设秘书监丞,寻改翰林典籍以掌之。”^{[1]2343}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诏儒士魏俊民等类编天下州郡地理形势、降附颠末为书(《大明志书》)”。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除书籍田器税”^{[1]21}。《明史·食货志》记载:“明初务简约,其后增置渐多,行贾居鬻,所过所止各有税。其名物件析榜於官署,按而征之,惟农具、书籍及他不鬻於市者勿算,应征而藏匿者没其半。”^{[1]1974}书籍等同于农业社会的田器、农具视之,足见图书出版所受到的重视。朱元璋一面聘请前朝遗老,修明礼乐制度,设置收书监臣,搜集各方图籍书版,一面立学校,行科举,诏修五经、四书等各类图书,且常常作注“制序”,躬亲垂范,以示重视。

明成祖于永乐四年(1406年)“命礼部尚书郑赐遣使访购(图书),惟其所欲与之,勿较值”^{[1]2343},十六年(1418年)诏修《天下郡县志书》,并“遣使编采天下郡邑图籍,特命儒臣大加修纂,必欲成书,贻谋子孙,以嘉惠天下后世”(《太宗实录》卷110)。永乐年初,成祖即命解缙、姚广孝等组织两千余人,先后两次编辑《永乐大典》二万余卷。这部集中国古典之大成的文献集,在当时对于笼络鼓舞读书人的心情,以及对于文化的恢复与建设,都产生了很大积极作用。

《明史·艺文志》载:“宣宗尝临视文渊阁,亲披阅经史,与少傅杨士奇等讨论,因赐士奇等诗。是时,秘阁贮书约二万余部,近百万卷,刻本十三,抄本十七。”^{[1]2343}史称“当是之时,典籍最盛”“仁、宣二主,世既承平,文物益盛”。仁宗、宣宗二帝对内阁藏书极为重视,但刻本三成、抄本七成的比例同时也证实明初期的印刷并不十分发达。

明初的统治者对图书编修工作较为重视,但事实上其出版却陷入了一个低谷,特别是民间出版行为,几近绝迹。“如果要一言以蔽之地概括明代初期的出版界,用‘贫乏’来表现它是最合适的。在天顺以前的明初一百年时间里,不仅在出版物的总量上呈现衰落趋势,其内容也显得很单调……或者我们也可以称这一百年为‘出版的冬天’。”^[7]明初的文人出版极少,且大多为元末文化繁荣的余波;私人刻书刻本也不多,流传至今的更为稀有。洪武年间的私人刻书有洪武十年(1377年)浦江郑济、郑洧兄弟刻印宋濂《宋学士

文粹》十卷;十七年(1384年)新喻付若川辑刻《付与砺文集》;三十一年(1398年)蔡伯庸刻《高季迪赋姑苏杂咏》一卷;宣德七年(1432年)周思德刻《道德经讲义》等^{[8]291-292}。

反观元末,出版虽有层层审查制度,但文人编修图书仍然有较大的自由空间,且成果颇丰。元明易代,以现在的研究成果来看,文人未受打击,知识分子并未遭受群体性迫害,在战争过程中许多文人甚至受到重视、重用。而进入明代初期,文人编修图书急速陷入低谷,其中战争破坏造成的经济衰退毫无疑问是一个重要原因。对于坊刻私刻而言,大众平民和多数小手工业作坊自然无力出版图书,但对于文人尤其是具备一定财力的大批上层文人,这种巨大的反差是很难解释的。这个疑问从明初统治者的统治思想中似乎可以探知一二。

文化与政治都属于上层建筑范畴。一定的社会文化是为一定的政治服务的,政治又通过社会舆论引导文化的方向,通过国家机器规范文化的走向,二者是不可分割的。在明代这种专制集权异常突出的时代,经济文化的发展固然会对出版活动产生重要的影响,但由于政治这一涵盖最高权力、最高决策、最大管理的国家和皇权意志,总是能最大程度左右经济、文化包括出版在内的一切活动的行为和走势。明代的出版活动首先并且最大化地受到专制统治思想的影响也就不难理解了。

受自身知识水平和文化修养的限制,明太祖对文化传承、文化传播不太可能站在比较高的高度给予看待,以其高度专制的统治思想而言,对于出版,他似乎更倾向于巩固政权、维护统治的目的。

洪武元年,即元朝北返蒙古高原的当年,明太祖便下诏编修《元史》,并于洪武二年(1369年)以李善长为监修,宋濂、王祿为总裁正式开局编写。这次编写仅用188天时间,由于编纂过于仓促,资料残缺,于洪武三年二月重开史局,再次纂修。两次历时仅331天。《元史》因编撰刊刻草率匆忙,其“文之陋劣”常为后人诟病,原因固然与朱元璋自身知识水平不高有关(《元史》编撰遵照朱元璋意图,强调“文词勿致于艰深,事迹务令于明白”,文字浅显,甚至保留了一些方言土语),但更大的可能是明太祖试图通过编撰《元史》加紧确立统治地位。急于成书一则按照后朝修前朝史之惯例,宣告蒙元已亡,明王朝正式建立,以安

定天下人心;一则宣扬其文治武功,意在获得知识分子的认可。明成祖修《永乐大典》《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似乎也出于类似的目的:一方面宣扬文治,笼络人心,另一方面通过控制图书、文人,强化思想管控。

基于这种政治统治思想,明初期绝大多数出版物是皇帝直接撰写或在皇帝的授意下刊刻的,属于官方出版的制书。此类出版物根据其内容可以大致分为三类。其一是制定封建等级制度、强化皇权统治类图书,如朱元璋训诫子孙的《皇明祖训》,制定官职的《诸司职掌》,规范礼仪的《洪武礼制》《礼仪定式》《大明集礼》等,再如国子监于洪武初年新刻之《贞观政要》,永乐二十年重刻之《武经七书》^[9]。其二是刑律惩戒类图书,如《大明律》《大明令》《醒贪简要录》以及《大诰》及《大诰续篇》《大诰三篇》《大诰武臣》等。其三是为维护社会道德秩序、思想教化类图书,如洪武《孝慈录》《精诚录》;永乐《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等。此外还包括戒僧道的《清教录》,钦天道的《大明一统历》,定字义的《洪武正韵》等。

强化皇权、严格刑律类制书被赋予了政治属性,具有了超越法律的权力,例如,《大诰》要求“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户户有此一本,若犯笞杖徒流罪名,每减一等;无者每加一等”;《大诰续编》重申“(《大诰》《续编》)发布天下,务必户户有之”;《大诰武臣》要求军队官兵及家属“人各一册”。再如洪武三年,“诏征江南诸郡民凡称大家者,悉赴阙,造之于庭亲训谕之……又恐其或遗忘而不能详也,则刻而为书,以摹本分赐之,名曰教民榜”^{[10]167},教民榜文之后也成为一种特别刑事法规。加强思想文化控制类以及其他种类的制书其编写目的也不出强化集权统治的范围,因而也同样带有浓重的以文谕政的政治意味。太祖编书《大学衍义》,仁宗谕杨士奇等“东宫就学,当以大经大法进说其前,史非圣道无裨于治者勿陈”^{[11]1243},以及屡见诸史籍的“刊赐廷臣”也可以证明这一点。因此,此类出版行为也就具有了较深的政治意义。

说到思想教化,必须要谈及的是明代的政治学说。明代以儒家思想为统治思想,以程朱理学为其政治学说。这一学说符合明初政权巩固的政治需要,能够说明明之代元、一统天下符合天意,能够解释明王朝建立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进而说

明朱明政权确立之后为维护统治以重法治国是顺理成章的。程朱理学被选择为明代的政治权威理论,在太祖开端至成祖完成的地位确立中,经历了一个思想理论的编织过程,期间大量儒家经典著作特别是程朱理学的相关论著被重视、出版。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诏谕中书省:“恒谓治国之要,教化为先。教化之道,学校为本。”^{[10]154}而后屡次下诏颁《四书》《五经》《通鉴纲目》《说苑》等有补“教化”的书于学校。明成祖敕修《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并规定科举考试以此命题,各地随即纷纷照样刊印。为确立并维护程朱理学这一文化思想学说的正统地位,说服并约束知识分子使之认可并自觉遵从,出版儒家典籍及各种延伸阐释也是十分必要的,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深刻影响并推动了明初的官方出版。

三

就此看来,书籍出版对维护统治的重要作用显然已经为明初期统治者所重视。针对从皇亲贵胄至平民百姓的不同阶层、不同群体,统治者使用出版书籍的办法传播王道,规范思想和行为,进而维护专制统治,这其中透视出皇帝的一种治国理念和文治思想。我们必须看到,这种思想仅仅体现在官方出版当中,对于“私刻”“坊刻”等民间出版印刷行为,统治者则展示出高压、严控的姿态。将这一对照置于明初的集权统治、专制统治之下显然并无抵牾,且极为合理。

明初政府对于图书出版流通有诸多禁令,对民间出版的管理极为严格。洪武六年(1373年)颁发的《大明律》规定:“凡私家收藏玄象器物、天文图讖应禁之书及历代帝王将相、金玉符箓等物者,杖一百。”“凡造讖讳、妖书、妖言及传惑众者,皆斩。”《明史》记载,永乐二年“秋七月壬戌,鄱阳民进书毁先贤,杖之,毁其书”。永乐九年(1411年),明廷命各地发布榜文:“但有亵渎帝王圣贤之词曲、驾头杂剧,非律所该载者,敢有收藏、传诵、印卖,一时拿送法司究治。”明成祖甚至作出极端批示:“但这等词曲,出榜后,限他五日,都要干净,将赴官烧毁了,敢有收藏的,全家杀了。”^{[12]347}此外,明朝严禁民间刊行私历,明刻本《大明万历七年岁己卯大统历》牌记曾载,明历书的封面均印有“大明□□□□年岁次大统历”字样,并钤有印记:“钦天监奏准印造历日颁行天下,伪造者依律处斩。有能告捕者,官给赏银五十

两。如无本监印信,即同私历。”^[13]对于民间史书刊刻尤其是当朝历史的编撰刊印予以限制似乎是明初统治者某种共识。但明太祖与明成祖出于不同的目的:朱元璋为了表明大明政权的正统性而对元明易代的历史进行重新解释,同时对自己受天命治天下的合理性进行宣扬;朱棣则是为了说明“夺位”的合法性,美化自己的篡权行为。两者严控史书出版虽然目的不同,但采取了相同的方法和手段,即统一口径,统一思想,导致私人撰写出版当代史书产生种种禁忌。

如果将明初专制统治对历书、史书、学术著作出版的限制和管控理解为一种思想的引导和约束的话,其对儒家经典之外的文学等书籍的创作和出版概括为极尽打击之能事亦不为过。谢无量1918年出版的《中国大文学史》在《明初文学》开篇即提到:“明太祖起自畋亩,开国之初,颇奖励文雅,征用遗贤。及海内既定,屡兴大狱。刘基、宋濂,夙荷帷幄之殊遇,至是并被疑忌。诗人高启之伦,辄用细故,坐伏斧质。其刻薄寡恩,亦已甚矣。逮夫燕王篡立,尤阴鸷好杀,歼戮异己,文士尤婴其祸。”^[14]²⁶文人命运如此,其创作和出版的境遇可想而知。

明初的出版管理“无统一的管理机构”^[13],与元代实行严格的出版审查制度不同,明代也无有关官书出版的制度及规定,重要的出版法令由皇帝以诏书的形式发布。这种出版环境貌似温和宽松,但在明初的强权统治之下实则复杂残酷,出版无律令可依,事后追究责任不可避免会具有较大的随意性,文字狱即为其极端表现。叶德辉《书林清话》中“明时官刻书只准翻刻不准另刻”所载嘉靖十一年“福建等处提刑按察司为书籍事”牒文,对建阳书坊刊刻五经四书的重要性、翻刻流程及责任追究作出了详细规定,“足见明时法制之严,刻书之慎”。^[15]¹⁴⁹由此可以看出明代政府对书坊刊刻官书并无明确定制,至少在嘉靖之前无明确规定,否则无需单独发文建宁府。皇帝诏书以及有司发文的形式说明明初出版并无明确典章制度,完全根据统治和个案的管理需要随机下发,体现了出版中的集权统治思想。

四

古代出版的主体除官方出版之外一般都是具有一定学识的文人,文人出版图书的积极性和指导思想必然受到其社会地位的影响。因此,探析

明初文人的社会地位对于探寻当时文人的出版行为和出版状态也具有一定实际意义。

朱元璋尽管重用笼络文人,但对其并不放心,稍有过错即施以刑罚,若不为所用更是随意诛杀籍没,“寰中士夫不为君用,其罪皆至抄札”(《大诰》)“寰中士大夫不为君所用,是自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大诰二编》)。皇帝对文人的肆意屠戮致使文人群体中蔓延着反抗情绪和政治恐惧,《明史·刑法志》记载:“贵溪儒士夏伯启叔侄断指不仕,苏州人才姚润、王谟被征不至,皆诛而籍其家。寰中士夫不为君用之科,所由设也”^[1]²³¹⁸。朱元璋对待文人的态度奠定了明初皇帝在此方面的政治思想基调。朱棣在“靖难”之后对文人的屠杀丝毫不逊于斯,之后“他采用软硬兼施的文治手段,使得天下儒士或噤若寒蝉,无所作为;或尽入其彀,充当学究。朱棣的手段,显然比乃父朱元璋赤裸裸地推行专制政策,更有咄咄逼人的封建威力”^[16]。仁宗、宣宗虽仁厚,也有当廷扑击李时勉、系狱劝学陈祚等惨剧。元末明初大家宋濂、刘基、高启等,其代表性成就均出自元末,入明以后,受政治压迫或政治威慑,或死于非命,或不能自由表达思想情感,故都少有超越前期之作^[17]。因此,说明初皇帝视士人为草芥亦不为过。

士人官吏的命运尚且如此,普通读书人想必也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明初文祸频生,文章、奏疏中一字一词都可能受到曲解猜疑而遭刑戮,出版书籍则不啻一种搏命之举。文人的社会地位和舆论空间被压制在极小的范围之内,使得明初文人群体与皇权的关系显现出一定的边缘性和对抗性。有出版能力和意愿的知识分子在创作出版上存在颇多忌讳,内心深处也必定存在一种政治恐惧,这甚至不是话语权被控制的问题,而是作为一个群体面临的生存威胁。

制书尽可能“人各一册”“户户有之”,而被认为可能危及统治的“妖书”、历书、史书、学术著作则要严格限制,这与明初统治者重视教化之道是分不开的。在明初的皇帝看来,自上而下的文化传播、思想教化是必要且必需的,但自下而上的影响则极有可能损害皇权,危及朝政,因此应被严格管束,这是统治者对出版的一种基本认识。可见,明初的出版与统治者意志存在一致性,出版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成为政治统治的重要工具和手段。

尽管明初期出版陷入了出版的“冬天”,但此

段时间的出版措施及相关政策仍然对明代中后期的出版产生了深刻影响。在这一时期,统治者一致认识到了出版对于维护政权统治、统一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并予以实践,而实践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出版的工具性作用给文人群体以启发——他们逐渐将出版作为一种手段运用于传播学术思想和发表政治意见当中。可以说,出版在明代中后期已经成为文人价值理念的重要实践形态。同时这种对出版的认识在市民阶层当中也被关注,并由此带动了明代中后期出版的商业化以及印刷技

术和纸张生产技术的进步。

还有一点需要指出,明初出版所处的专制集权统治的历史背景,与清代中前期出版的政治社会环境相类似,即两个时期从皇权统治的角度均表现出严重的思想钳制和文化管控,但是明初期与清中前期在统治者的政治追求和文化水平、出版的经济条件和技术条件、社会整体的思想文化状况等诸多方面都存在巨大差异,因而各时期政治统治下的出版也必然具有其各自的特点。其中差异或可成为今后研究的方向。

参考文献:

- [1] 张廷玉. 明史[M]. 北京:中华书局,1974.
- [2] 缪咏禾. 中国出版通史·明代卷[M].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8.
- [3] 梅尔清. 印刷的世界:书籍、出版文化和中华帝国晚期的社会[J]. 刘宗灵,鞠北平,译. 史林,2008(4):1-9.
- [4] 陆容. 菽园杂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58.
- [5] 沈燮元. 明代江苏刻书事业概述[J]. 学术月刊,1957(9):78-81.
- [6] 孟森. 明史讲义[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 [7] 井上进. 论明代前期出版的变迁与学术[J]. 北大史学,2009(1):1-17.
- [8] 张树栋,庞多益,郑如斯,等. 中华印刷通史[M]. 台北:财团法人印刷传播兴才文教基金会,2004.
- [9] 阚敏. 明代国子监的出版事业[J]. 图书馆学刊,1996(4):33-35.
- [10] 陈建. 皇明通纪:上[M]. 钱茂伟,点校. 北京:中华书局,2008.
- [11] 谈迁. 国榷[M]. 北京:中华书局,1985.
- [12] 顾起元. 客座赘语[M]. 北京:中华书局,1987.
- [13] 刘孝平. 明代出版管理述略[J]. 图书情报知识,2004(6):55-57.
- [14] 谢无量. 中国大文学史[M].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
- [15] 叶德辉. 书林清话[M]. 北京:中华书局,1957.
- [16] 任道斌. 论明代学术文化的发展[J].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1991(1):39-45.
- [17] 王齐洲. 近百年明代文学与政治研究述评[J]. 荆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3):1-9.

The Ruling of Imperial Power and Publishing Industry in Early Ming Dynasty

QIN Haiming

(Academic Periodical Press, Huaihai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Lianyungang Jiangsu 222005, China)

Abstract: The publication in Ming Dynasty is considered in the highest position of ancient China. However, it varied in different periods and maintained at a lower level from Hongwu to Xuande, even less active than late Yuan Dynasty. Such a decline is mainly attributed to the restriction of autocracy. It is mainly embodied in such aspects: the ruling classes' focus was limited to imperial publication to some extent; non-governmental publication was basically suppressed and strictly controlled, which was aimed at moral cultivation and the maintenance of autocracy. In addition, intellectuals were oppressed as a whole in the tyrannical background of early Ming Dynasty, with lower social status and bitter life, which was a severe blow on individual publication activity. Generally, the publishing industry in early Ming Dynasty turned to be a ruling tool of imperial power, representing the ruling ideas at that time.

Keywords: early Ming Dynasty; the ruling of imperial power; publishing; periodical; intellectuals

(责任编辑:沈建新)